

空间理论视角下 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

杨菊华

提要:本文从社会学空间理论出发,突出“流动”“老年”的交叠属性,检视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数据分析结果发现,该群体的社会适应呈现“高心理—中行为—低文化”模式:对流入地的认同与归属感强,但行为适应不足,文化适应更难。尽管老年人的地域流动打破了物理边界,但制度边界与社会边界却未得到重构,故而造成其适应理念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张力。模糊制度和社会边界、增强心理和精神空间的可达性是有效推动老年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重要着力点。

关键词:老年流动人口 物理空间 社会空间 精神空间 社会适应

一、研究的缘起

老年流动人口指因就业、照顾子女或孙辈、养老等原因而到户籍县市之外持续生活较长时间的60岁及以上人口。该群体涉及当下两个最重要的社会人口现象——快速的人口老龄化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2015年,60岁及以上流动人口达1800万,占当年同龄人口的8.4%、流动人口的7.2%。该数值可能低估了老年流动人口总量,而且该群体还会以较大规模持续存在(杨菊华,2018a)。在全员人口大流动时代,尽管流动人口的年龄选择性大大降低(Tong & Piotrowski, 2012),但老年流动人口依旧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家庭因素是其流动的主因:据统计,老年流动人口中为照顾孙辈而流动的占比高达43%,为与子女团聚或异地养老者占25%,务工经商者占23%(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 2016)。

* 作者感谢匿名评审者的意见和建议,但文责自负。

年长人口的社会网络多扎根于流出地,他们的生活习惯、文化习性根深蒂固,可能更倾向于安土重迁。对低龄流动人口而言,流动是社会化过程的延续,但对长者而言,地域流动改变了他们惯常的生活空间。面对新的社会文化场景,初来乍到的他们可能难以适从,必须经历再社会化过程。与已然熟悉的场域脱嵌,既可能使他们受益,^①也可能使其面临更大的生活、文化等方面的调适困境。

然而,老年流动人口因多已退出劳动力市场,度过了生命历程中的教育、生育、就业阶段,往往被视为无特殊问题群体(Fassmann & Münz,1994)而被忽视。屈指可数的早期研究主要落脚于流动原因(周皓,2002;孟向京,2009),重在“流动”。近年来以退休迁移三阶段论(Litwak & Longino,1987;Longino & Bradley,2003)为视角的研究(姜向群等,2012;陈友华,2016)则重在“养老”。这些研究多是“流动”研究或“老龄化”研究的附属品,老年流动人口或被淹没在老龄化,或被淹没在流动人口研究中(杨菊华,2018a)。将“流动”+“老年”双重属性有机结合并聚焦于此的政策关照和学术关怀凤毛麟角,而以老年流动人口社会适应为主题、结合空间理论视角的实证研究则基本未见。

“适应”是人一生的事业。居住环境或空间的变换(又称空间流动、空间转移、空间转换、空间位移等)可能使流动者面临环境不适(Yaskevich et al.,2014)、文化障碍、福利支持阙如(Hall & Hardill,2016)、精神生活单调、社区参与少、对城市社区的认同度低(姚兆余、王鑫,2010)、养老服务不足(Habermann & Stagge,2015)等困境,必然引发心理、行为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适应需求。2010年后,一些经验研究和个案研究以老年流动人口为聚焦点,关注他们的社会适应(苗瑞凤,2012;余昆,2013;李敏芳,2014;江立华、王寓凡,2016;王颖、黄迪,2016;王泳仪等,2017)、心理融入或融合(刘亚娜,2016;张新文等,2014;侯建明、李晓刚,2017)等议题。

既有文献积累了学术智慧,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但因为社会适应与空间概念的内涵都很丰富,现有研究在概念的界定、理论的阐释、指标操作的合理性及因素之间的关联性等方面侧重不同,各有短长。比如,多数研究仅将“空间”视为物理空间(又称物质空间、地理空间),但“空间”也包含抽象的社会和精神空间(Lefebvre,1991),而多维空间转换及其社会效应尚未引起学界关注。不少研究都使用“社会适应”概念,但在指标的操作化上却莫衷一是,因而研究之间

① 比如,流动带来的家人团聚可保证长者更便捷地获得所需支持,照顾孙辈可让老年人享受天伦之乐并增强自我效能感,务工经商可带来更高的收入,而异地养老更可能是老年人的自我选择。

的可比性较弱。那么,当我们讨论空间变换时,究竟在说什么?对于老年流动者而言,社会适应的核心特征是什么?空间变换可能对该群体的社会适应带来较大的难度,但如何更合理地捕捉空间变换的适应后果?对此,学术讨论与学理研判都还十分不足,故而我们对该群体在流入地的基本生活状况不甚了了,对其内部的异质性也未能有效把握。

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有所回应,利用具有时效性、代表性的大规模调查数据,突出“流动”“老年”的双重属性,关照物理、社会和精神(文化/心理)三个空间维度,多面向地描画老年流动人口的适应状况,探讨空间变换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联性。需要说明的是:其一,“适应”涵盖社会层面和家庭层面,家庭关系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由于数据所限,本文仅考虑社会层面而非家庭层面的适应。其二,本文采用“适应”这一概念而非“融入”或“融合”,是因“适应”更为中性,不涉及流入地或流出地“好”与“不好”的价值判断。比如,老年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感更强或行为习惯与本地人更为接近,并不意味着流入地的习俗优于流出地的习俗或老年人既有的文化。

本文以社会学的空间理论为引领,关注老年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多个领域,在学理上是对社会适应理论的有益补充与拓展,也是对空间理论的实证检验。作为一种后现代的社会学理论,空间理论因其意旨抽象而难以进行实证检验,而本文是将其用于指导实践、通过实践检验理论的一种尝试与探索。在现实中,空间变换必然要求心理、行为、文化等方面的调适,而调适的好坏,对于流动者获得健康愉快、有尊严和有质量的生活以及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等都格外重要。如难以与时下的生存环境同步,则可能引发心理郁结,不利于身心健康与家庭和谐,也不利于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关注老年流动人口的适应状况与痛点,加深对该群体适应特征的把握,可探索促进其社会适应的路径与策略,通过更具包容性的公共政策和社区服务项目等帮助他们慢慢摆脱“水土不服”,逐渐参与流入地的社会生活,实现“心安之处,便是吾乡”。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人口的地域流动带来空间变换,而空间理论为研究老年流动者的社会适应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分析框架。

(一) 三类空间

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是具有实践活动意义的场域(Lefebvre, 1991; 潘可礼, 2015),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作为最早系统论述社会学空间理论的学者,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空间既有空洞化的物理空间,也有充塞着各种关系的社会空间,还有符号式的精神空间,即空间至少具有三维性:物理、社会和精神(或称表象空间、情感空间或文化空间)。

物理空间是人们居住和日常生活嵌入之所,是实现功能性活动的场所,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场域,有几何尺度,地理位置明确,边界清晰,看得见,摸得着。几户邻里,一个社区,都属于物理空间。在一个时点,人们只能存在于一个特定空间中;而在不同时间,人们可进行物理空间的变换。当然,物理空间并非仅具简单和纯粹的物理属性,不是“自为的”“自在的”“自然空间”,而总与人类的活动紧密相连(张笑夷, 2018),嵌入了丰富和独特的社会与精神文化内涵,是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具象载体或实践场域。

社会空间的边界较模糊,内容较抽象,既有别于具象的物理空间,也有别于更抽象的精神空间(林聚任, 2015),是社会群体感知和利用的空间,也是社会活动和社会组织占据的空间,反映社会群体的价值观与偏好。源自集体生活的社会空间(涂尔干, 2011)存在适用于一定群体的独特的社会制度和规定,充斥着利益、权力和矛盾,人们在开放或封闭的社会制度规定和允许的范围内互动(杨彬, 1996),构建不同类别和程度的社会关系,编织社会网络,进行社会互动,满足自身社会和精神情感需求(江立华、王寓凡, 2016)。

精神空间最抽象、最具主观性,居于空间层次的最高层且边界最模糊。大略来讲,精神空间是个体心灵、情感归属之所,关乎人们对自身角色的认同。本质上,它是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聚合体,是对其他空间的精神情感体验,可表现为不同倾向的依恋和拒斥(江立华、王寓凡, 2016)。精神空间也指个体对客体认知反应后形成的行动逻辑,规范、引领、制约主体的行动。

这三类(尤其是后两类)空间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彼此嵌入和相互渗透,由此给实证研究带来了复杂性。笔者在言及社会空间时,更突出它的公共制度和社会属性,如与老年流动人口相关的社会制度;在言及精神空间时,更强调它的私域和心理属性,如个体内心对流入地的感知与认同。不同的空间构成了老年流动人口的适应场域——物理空间的变换必然牵扯到其他两类空间的调适需求。基于此,本文所言的老年流动人口的空间变换并非简单的地理空间变换,而是发生在空间移动基础之上的物理、社会、精神等多维空间的场域变换。

(二) 社会适应

社会适应指个体逐渐接受现有社会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能在规范允许的范围内对特定环境中的社会刺激做出反应,即人们为与外部生存环境达成和谐关系而进行的一系列心理态度、行为模式和文化观念调适,是个体与环境因素不断相互作用和彼此博弈的过程与结果,涉及主体、情境和变化三类要素。面对外在环境的转移,人们通常会采取相应的策略,以适应新的环境、满足物质和精神需求。在某种程度上,适应是个“主动”的单向度概念。

社会适应关涉过程和结果双重面向:过程是个连续统,结果则是该连续统中的一个节点性表征,分别代表了个体在新环境中某个时间节点的状况。在初期适应阶段,植根于旧情境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对个体的生活依旧十分重要。随着在新环境中生存时间的延长,个体逐渐开始接触新环境中不熟悉的价值与行为系统,对新环境中的社会刺激做出积极和正面的反馈,与他人建立关联,逐渐认同其中的(部分)元素,接纳其价值与行为规范,日渐融入所处环境并与之和解。连续统的终端是个体对自身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的全方位调适,对新环境的全面适应,行为模式和价值体系完全融入其间。

对老年流动人口而言,心理、行为和文化适应可能最为重要。心理适应是指流动者对流入地的依恋程度与心理距离。认为自己只是暂时漂泊在或寄居于他乡异地,流入地社会是“他们的”而非“我们的”,自己的“根”依旧在家乡,对流入地社会缺乏归属感等,则表明他们的过客心态强烈,在心理层面尚未适应。行为适应重在行为,指老年流动人口适应流入地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主要表现为流动者按流入地认可的规矩办事,行为举止向当地人靠拢。认可和接纳流入地的价值取向、观念风俗等反映的是文化适应——尽管心理适应和文化适应之间边界模糊,但二者的核心意涵依旧具有区分度:前者重在心理预期,后者重在价值取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不同的地域造就了差异化的生活样式和价值观念。相对于低龄流动人口而言,老年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的差别可能尤为凸显。他们虽不必认同流入地主流文化,但只有尊重、了解当地文化,方有可能逐步适应流入地社会。

(三) 空间变换与社会适应

将空间理论应用于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流动老年人从熟悉的家乡到陌生的他乡,地理位置变换带来了新的适应需求,但因空间性质、空间距离及个体禀赋差异,不同个体的适应过程必然有别。比如,在以

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信息社会中,空间距离形成的文化隔离与冲突、心理隔阂与断裂等都在弱化,成长于智能技术时代的年轻人在发生空间位移后的适应诉求相对较低。不过这仅是一般性的规律,因为空间不仅是“空洞的物理空间”,更是充满制度和规则的社会性空间,故个体的社会适应也受制于空间的制度和政治规则。老年人的流动把“流动”和“老年”这两个属性交织在一起,也使得他们具有了双重身份。相较于一般老年人口,他们的生命历程具有断裂性和不连贯性(李芳、李志宏,2016);同时,作为一个已有相对稳定的价值和行为定式的人群,他们的适应难度更大。

通常来讲,流出地是流动个体行为和资本获取与聚合之所,原住民身份和据此获得的各类资本可在这一场域的制度空间中保障个体的相应权益。而空间变换带来的变化是跳跃性和断裂式的,他们将要面临新的空间环境突如其来的冲击。他们脱离原生的生活场域,脱嵌于既有的社会关系,与熟人社会发生撕裂,进入物理、社会及精神文化都较陌生的新空间,不得不进行社会资本的重构、价值体系的重塑以及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调适。而这些都发生在多维空间中。本文即从物理、社会、精神空间三个维度来探讨空间变换的社会适应效应。

1. 物理空间的跨界与社会适应

从流出地到流入地的物理位移伴随着多维空间的变换。首先是物质场域的变化。物理空间是老年流动人口进入流入地后触及的初始空间,主要涉及“量”的变化——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移动,如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从省内某市到另一个市,从市内某县到另一个区县。当然,个体的归属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的划分上,更是一种社会与心理精神的归属。嵌入独特的物理空间的规则、资源和权力建构起了看不见的社会空间或制度空间,故“量”的变化中隐含着“质”的不同。因此,在铺陈其权力—知识建构身体叙事时,福柯采用了空间视角(郑震,2010),认为空间是公共生活形式和权力运作的基础(陈薇,2015);同理,在吉登斯的理论中,场所是指互动的情境,其物理维度及其“结构”是互动体系与社会关系的聚合所(夏玉珍、姜利标,2010;牛俊伟、刘怀玉,2012)。换言之,流动距离不仅意味着物理空间边界的跨越,也隐含着社会制度的区分、心理归属感的重构以及文化的调适。当一个文化集团的人进入另一文化集团时,文化冲突就会发生(杨春洗等,2003),认同感与归属感就需重新塑造。流入地与流出地的空间距离越远,两地的制度和差异可能就越明显,两地的行为方式、价值体系之间就越可能发生规范性的冲突,且冲突程度也会更加剧烈。认同感与归属感也是如此。由此得到假设1。

假设1:老年流动人口跨越的物理空间越大,社会适应程度相对越差。

2. 社会空间的流转与社会适应

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具有政治属性,是一种政治产物,是实现国家统治的重要政治工具(姜俏含,2015)。国家利用空间对各地区进行分层管控,并对社会阶级进行区分化治理。分层管控往往通过各类社会制度在社区层面落实。通过将空间概念与场域加以统一,并使之与资本、惯习连接起来,布迪厄形成了空间化的场域理论(许伟、罗玮,2014)。场域并非一种地理空间,而是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从中可透视出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系统或网络构型,是社会高度分化后产出的诸多“社会小世界”(布迪厄、华康德,1998)。当老年人跨越地域界线进入新的社会空间时,其行为、认知、生活方式等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新的“统治群体所掌握的知识和意识形态的影响”(Lefebvre,1991)。但是,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文化观念与习惯往往已根深蒂固,置身于新空间后,“新旧体系”未必可顺利过渡并实现平衡。与外在环境的碰撞、矛盾与冲突既可能促使个体采取积极行动,主动适应环境并努力融入其中,也可能阻碍适应进程的顺利进行。开放取向的社会空间表现为制度与其他要素之间的互补性和相容性(杨彬,1996),封闭的社会空间则具有排他性。若流入地有良好的社会支持环境(王世斌等,2013),积极接纳老年流动人口,将其纳入服务和福利覆盖范围,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则有助于拉近本地—外来老年人口在行为、心理和文化方面的距离。由此得到假设2。

假设2:若变换后的社会空间更具有包容性和融合性,则老年人更易适应。

3. 精神空间的递达与社会适应

空间更是一种基于物理空间的社会性和观念性的建构(Lefebvre,1991;郑震,2010)。地域流动并非简单的“迁居”,而是伴随着一系列的社会、精神或文化空间的变换,“迁居”背后蕴含着各种相互纠缠的制度、结构与精神文化。虽然非物理空间没有明确的物理边界,却有实在的社会边界,规约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制约或推动个体功能性活动的实现。人们生活于其间,在日常点滴中对各种符号进行解码,形成一种逻辑—认识论的精神文化空间。老年人进入陌生空间时,也面临更深层次、更为抽象、包括非语言的象征和符号系统的精神空间的变换。而个体适应进程的顺利推进不仅意味着私人关系的建立,而且意味着公共空间关系网络的进一步拓展。尽管公共空间作为社会生活交往的场所,是“所有人都能合法进入的城市区域”,是“陌生人碰面的地方”(陈竹、叶珉,2009),但关系网络的建立与拓展都需以对符号的解读达成一致为基础。若双方

在互动过程中对符号的理解有所不同,则不利于交往的展开,甚至会导致矛盾的产生。对符号解读规则的认知蕴含于文化之中,并在个体社会化进程中逐渐内化(杨春洗等,2003)。若符号解读规则差异不大,对价值理念多已固化的老年人而言,社会适应难度就会小一些,适应进程就会更为通畅。同理,若流入地的文化更具有兼容性,生活于其间的老年人可能更易与本地老年人和制度环境之间发生互动和彼此渗透,对符号的阐释也更容易达成一致,(半)陌生人社会可更快速演变为(半)熟人社会,老年流动者社会适应的积极性、主动性甚至创造性也会随之增强。由此建立假设3。

假设3:若转变后的精神空间更具有可达性和兼容性,则更利于老年人的新环境适应。

三、数据与方法

本文利用规模大、覆盖面广、代表性较强、信息较丰富的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来检验上述假设。关于调查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司(2018)的详细说明。其中,60岁及以上样本为6478人,排除本文所用变量的缺失样本后,进入分析的样本量为6051人。

(一)三类适应的度量

美国移民研究专家戈德柴德尔(Goldscheider,1983)在其经典著作中详细论述了发展中国家城市移民社会适应的基本意涵及其度量;新世纪后,艾尔巴和李(Alba & Nee,2003)、格里克和派克(Glick & Park,2016)等分别对移民的融合或适应理论与度量进行了系统性的重新审视。基于现有具有影响力的研究和老年流动人口的属性,本文从心理、行为和文化三个维度来考察适应。基于数据的可及性,每个维度分别采用一个能较好体现该维度特点的变量来度量调查时点的适应结果。

心理适应:本文使用了一个简单量表加以测量,含有“喜欢现居地”“关注其变化”“愿意融入其中”“觉得得到了本地人的接纳”“觉得自己已是本地人了”五个指标。KMO检验结果显示,指标间的相关系数为0.833,表明指标效度很好。基于此,利用主成分法提取出一个信度很高的公因子(潜变量可解释总变异的70%),命名为“心理适应”。为便于解释,对该变量进行

标准化处理,形成一个值域介于 $[0,100]$ 的变量,取值越大,表明心理适应程度越高。

行为适应:行动者个人的实践遵循着既往的轨道与惯习,呈现出历史图式、结构性规范与重复性。饮食习惯、消费行为、卫生行为(Glick & Park, 2016)等作为最易受影响的因素,均可用于度量行为适应。卫生习惯是个人行为适应最初且重要的指征,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更高。若连卫生习惯都难以适应,其他方面的行为就更难适应。调查也问及老年人与本地市民在卫生习惯方面的自评差异,是较好的行为适应操作化指标,^①该指标取值从1到4,分别表示自认为卫生习惯与本地市民之间很有差距、有较大差距、有些差距和没有差距。

文化适应:传统惯习及文化价值观念变化是文化适应的重要指征。惯习使个体生活于过往的制度中,难以使传统摆脱无效状态(布迪厄,2003)。调查问及受访者是否认同“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办事对我比较重要”,为测量文化适应提供了一个较为科学的操作指标。其取值从1到4,分别表示按老家风俗习惯办事很重要、重要、不太重要和很不重要。虽然对老家传统文化的保有度与本地文化适应度之间并非绝对负相关,但老年人受风俗习惯影响最深刻,其价值取向的变化与流入地文化适应的关系更为密切。对传统惯习的否定程度越高,可能表明受流入地文化的影响越深,文化适应程度越高。^{②③}

(二)三类空间的测量

基于文献及笔者对空间理论的理解,本文用以下变量测量三类空间。

物理空间:物理空间即实践空间,是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有清晰的地理边界,可用跨越的行政区域来测量,分为跨省、跨市、跨县流动。在中

① 这里必须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克服潜在假定,即流入地居民卫生习惯优于流出地。不过,因调查问题问及的卫生习惯主要是指随地吐痰、如厕后洗手、刷牙洗脸洗澡等最平常的卫生行为,也因多数老年流动人口来自农村,而他们在初级社会化过程中较少接受相关教育,故客观地说,长期的生活习惯可能使他们对基本的卫生行为不太注意。另外,如前所述,本文只进行客观陈述,不作价值判断。

② 文化适应与心理适应边界交叉,但本文尽可能使用有区别的变量分别进行测量。

③ 文化适应是指流动人口在价值观、生活习惯、语言宗教等诸多方面的再社会化过程。流动人口首先经历的是自己原有社会的角色系统的调整,然后才建立起新的角色系统。传统文化的保有一直是文化适应的重要度量指标(Goldscheider, 1983; Glick & Park, 2016; 悦中山等, 2017),其本身就带有一种价值判断、价值取向或文化接纳。它虽然是数据中所见的唯一指标,但并非唯一的度量。

国,跨省是最大的行政空间变换,而跨县(市、区)所涉及的社会与文化变动较小。物理空间也包括公共活动空间的改变,对老年流动人口而言,社区是他们最主要的公共活动空间。本文用连片出租屋、小商店和无障碍设施三个变量来测量公共活动空间的融合性。出租屋反映的是人群在物理空间上的聚集以及这种聚集体现的社会氛围。连片出租屋表明此地可能是外地人的聚合之所,不利于外来人口的本地适应;小商店作为一种公共生活和社会符号,可成为流动者与本地人的聚合之所;无障碍设施给年长者提供出行便利,或可增强对现居地的喜好,成为社会适应的加速器。它们均为二分类变量,1表示“是”,0表示“否”。

社会空间:社会空间蕴含制度等级关系和公共生活形式,又分为三类。(1)制度空间:户籍类型把外地人区分为城—城与乡—城流动人口(杨菊华,2018b)。通过检视城—城与乡—城流动人口,可识别户籍制度效应。居住证和社会保障卡与户籍相关,反映流入地对流动老年人的接纳程度及老年人自身的“主动”适应行为,故利用农业户口、暂住证/居住证和社保卡三个变量来度量制度空间效应。它们均为二分类变量,1表示“是”/“有”,0表示“否”/“无”。(2)网络空间:度量为主要交往对象为本地人、外地人或无交往。它关注流动者的生存空间有无拓展、人际关系有无扩张、交往内容是否丰富、互动范围有无扩大、网络异质性有无增强,折射出他们对符号理解的一致性程度,可度量社会空间的包容性。(3)社区空间:度量为所在地是否有流动人口的党团组织、是否有法律援助室。前者为流动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后者给他们的权益保证提供了一个渠道。它们均为二分类变量,1表示“有”,0表示“无”。

精神空间:精神空间指向个人感知性的文化符号解码,包括概念化、抽象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等,以三个指标来捕捉其变换效应。(1)歧视感知:这一指标代表个体对新空间的情感或符号解码。(2)在本地的长期居住打算:考量精神空间理论中的归属感和依恋感。精神空间作为个体心灵、情感归属之所,关乎人们对自身角色的认同,表现为不同倾向的依恋与拒斥。(3)文化适应:文化是空间理论中更高层次、更抽象的精神空间。“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办事对我比较重要”变量可反映流动者价值观念的稳定性,也是个体对流入地文化感知的一种投射。它既是本文的因变量之一,也被用于预测行为和心理适应,考察不同层面社会适应的关联性。当然,精神空间度量与心理和文化适应之间存在非递归关系,本文重在关系探求,而非因果分析。

(三) 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研究成果,基于数据的可及性,本文控制了以下三类变量:(1)人口与经济特征: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等。(2)流动特征:包括流动原因和居留时间。一般情况下,流动原因意味着流动目的和对流入地的预期,作用于社会适应。随着居留时间的延长,流动者的生存空间得以拓展,也对流动人口进行了筛选和淘汰,剩下的老年人越可能适应流入地的空间环境。(3)家庭因素:即流入地的家庭规模、家庭总收入(取对数)和在老家是否有困难。流入地家庭规模越大,老年人的交往越可能集中于家庭内部,与其他人的交往减少;流入地家庭经济状况越好,意味着老年人可利用的资源越多,越可能与外界发生联系,进而正向作用于适应水平;老家的困难可能会减弱流动老年人与本地老年人的共处意愿,抑制彼此的互动行为,且对老家的惦记使得他们难以安心并主动去适应流入地的生活。

四、主要数据分析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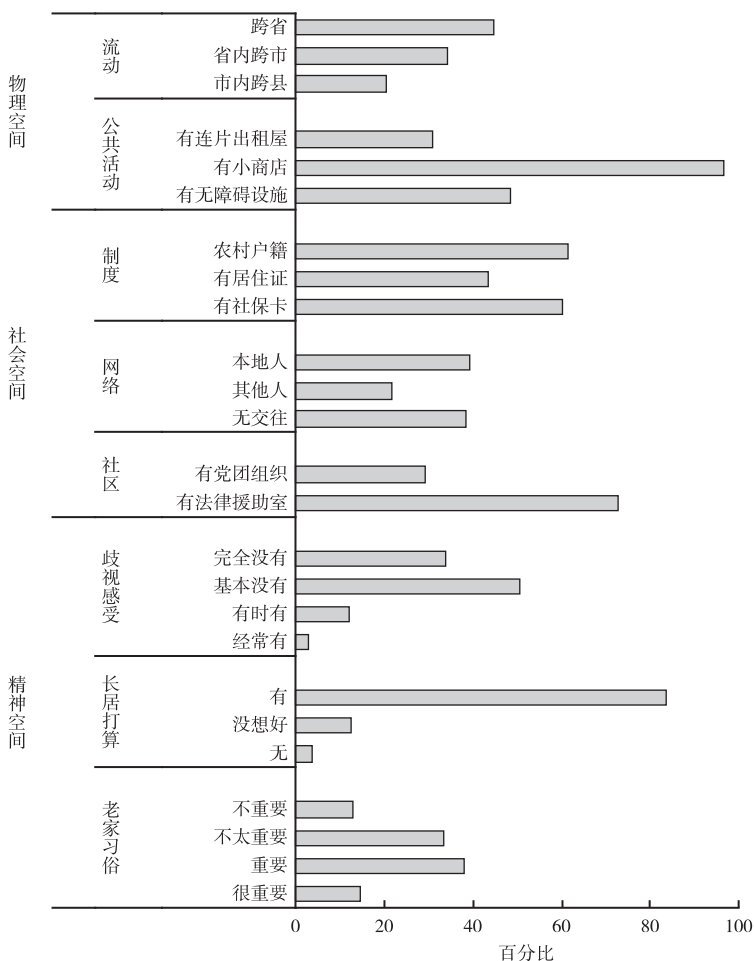
数据分析采用三个依次递进步骤:单变量分析把握变量的基本分布状况,交叉分析考察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模型分析检验理论假设。考虑到流动老年人的异质性,除全部样本外,还对部分子样本进行建模。

(一) 变量分布

在三个因变量中,心理适应得分为81.35分,标准差为16.55,表明多数受访者对本地抱有积极的认同态度。78%的流动老年人认为自己的卫生习惯与流入地市民之间差别不大。但是,因卫生习惯转变对外部环境的支持要求较低,故通过该指标反映的行为适应程度亦不高。就文化适应而言,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按老家习俗办事依旧比较重要或很重要,而认为很不重要的仅占1/8,表明尽管受访者对现居住地的归属意愿很强,但他们依旧保有较强的原生文化价值取向,文化适应相对较弱。

图1展示了空间测量指标的基本分布。如图1所示,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度量变量都有足够变异。

而且,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三个适应测量与多数空间变量高度显著相关(结果在文中没有呈现),适合做进一步的模型分析。



数据来源: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图1 空间要素的基本分布情况

(二)模型设定

在三个因变量中,心理适应为连续变量,可采用常规最小二乘(OLS)模型进行分析;卫生习惯和文化价值取向均为四分类变量,类别间蕴含逐层递增之意,故宜采用序次 logistic 模型;模型的系数值越大,意味着心理适应程度越好,与本地人的卫生习惯差距越小,对老家的文化习俗越不认同。为纠正同一样本点流动人口在社区特征方面的聚类性,本文运用稳健标准误加以处理。

模型分析策略采用三个步骤:首先对全部样本进行分析,以总体把握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考虑到在不同年龄、因不同目的而流动的老年人对流入

地的预期和需求可能有所差异并对其适应水平发生影响,故第二步和第三步分别对按初始流动年龄区分的子样本、按流动原因等区分的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考察空间度量是否会给具有不同特征的受访者带来差异化的影响。

(三)模型分析结果

1.全部样本模型分析结果

如表1展示,空间变换与老年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关系部分地验证了假设1。首先,就物理空间而言,相对于市内跨县流动的老年人跨省流动的老年人心理适应得分更低,表明其适应程度更低。该变量对行为习惯的影响仅微弱见于市内流动与跨省流动之间,而且物理空间变动属性与保有老家文化习俗之间缺乏显著的统计关系。就社区公共活动空间而言,有连片出租屋会减少流动老年人与本地人交往共处的机会,故在心理上抱有更突出的外地人心态,行为上与本地人的差距更大,在文化上更习惯老家风俗(虽不显著)。反之,小商店的存在可能会给提供交往场所并改善老年人生活的便利性,由此减弱行为习惯和文化适应的阻力。无障碍设施等则会提升心理归属感和行为适应度。

其次,社会制度空间与行为适应的关系也部分地验证了假设2,虽然未必具有统计意义。相较于城一城流动人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心理适应较差,与本地人卫生习惯差距更大(但不显著),保有更强的传统文化观念。若办理了居住证/社保卡,则适应程度更好,虽然唯有居住证与卫生习惯的关系是显著的。网络空间对适应有显著影响。相较于与本地人交往的老年人而言,与其他人交往或不与人交往的老年人心理适应更差,与本地人的卫生习惯差距更大,更认同老家的风俗。社区的党团组织可显著提升受访者的心理和行为适应程度。组织的存在或许让流动老年人有种找到了组织的感觉,在流入地的权利、资源等或可得到部分保障,组织开展的日常活动也有助于提升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党团组织的存在让流动人口更倾向于认同老家的文化习俗,这与预期和常识不符,但或许与调查问题询问社区是否有“流动人口党团组织”有关。法律援助室仅与行为适应正向相关。

最后,精神空间对这三类适应指标都有显著影响。与完全没有感到歧视的老年人口相比,感到基本没有、时有或常有之人心理适应性更差,行为适应更难,更可能认同老家的文化习俗;而长期居住打算与心理、行为和文化适应都高度正向相关,且从系数判断,也是模型各变量中与心理适应关系最强的要素,结果印证了理论假设3。文化空间对心理适应和行为适应的作用同样十分重要。若认

为老家习俗很不重要,则行为习惯更接近本地人,且从系数上看,不同观念的影响差距巨大。老家习俗的重要性与心理适应之间呈现 U 形关系。

可见,除个别情况外,主要自变量与各因变量的关系类似,虽然程度有别,表明流动老年人的社会适应的确受制于物质、社会和精神空间。

表 1 老年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 OLS 模型或序次 logistic 模型分析结果(全样本) N = 6051

	M1 (心理适应 OLS 模型)		M2 (行为适应 ologit 模型)		M3 (文化适应 ologit 模型)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物理空间						
流动空间(跨省为参照组)						
省内跨市	0.636	0.437	-0.032	0.061	-0.065	0.055
市内跨县	1.637 **	0.523	0.123 ^	0.073	-0.048	0.067
公共活动空间						
有连片出租屋	-1.599 ***	0.411	-0.184 ***	0.057	-0.069	0.052
有小商店	-0.815	1.080	0.340 *	0.145	0.383 **	0.136
有无障碍设施	1.524 ***	0.411	0.123	0.056 *	-0.062	0.053
社会空间						
制度空间						
农村户籍	-1.020 *	0.493	-0.086	0.069	-0.379 ***	0.063
有居住证	0.582	0.399	0.131 *	0.056	0.056	0.051
有社保卡	0.399	0.407	0.004	0.056	0.012	0.052
网络空间(本地人为参照组)						
其他人	-2.029 ***	0.519	-0.121	0.072	-0.247 ***	0.065
无交往	-1.606 ***	0.428	-0.146 *	0.060	-0.177 ***	0.055
社区空间						
有党团组织	1.645 ***	0.428	0.119 *	0.060	-0.154 **	0.055
有法律援助室	-0.193	0.438	0.254 ***	0.061	-0.029	0.056
精神空间						
歧视感受(完全没有为参照组)						
基本没有	-7.919 ***	0.453	-1.662 ***	0.067	-0.721 ***	0.055
有时有	-10.758 ***	0.652	-2.165 ***	0.095	-1.170 ***	0.081
经常有	-1.530	1.103	-2.773 ***	0.167	-1.855 ***	0.155
长居打算(有为参照组)						
没想好	-14.149 ***	0.990	-0.439 ***	0.135	-0.511 ***	0.129
无	-5.736 ***	0.576	-0.187 *	0.077	-0.233 ***	0.072
老家习俗(不重要为参照组)						
不太重要	-3.498 ***	0.651	-1.845 ***	0.112	—	—

续表 1

	M1 (心理适应 OLS 模型)		M2 (行为适应 ologit 模型)		M3 (文化适应 ologit 模型)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重要	-6.733***	0.645	-2.270***	0.113	—	—
很重要	2.131**	0.739	-2.035***	0.126	—	—
人口与经济特征						
年龄	0.008	0.037	-0.003	0.005	0.009 [^]	0.005
性别(男性为参照组)	-0.330	0.408	-0.001	0.057	0.070	0.052
教育(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						
初中	0.221	0.469	0.131*	0.065	0.003	0.060
高中及以上	1.398*	0.569	0.287***	0.080	0.146*	0.072
就业状况(不在业为参照组)	-1.444**	0.560	0.112	0.078	-0.092	0.072
流动特征						
流动原因(经济为参照组)						
家庭	0.178	0.577	0.230**	0.081	-0.046	0.074
社会	1.234	0.699 [^]	0.059	0.097	-0.063	0.090
居留时间	2.387***	0.233	-0.056 [^]	0.032	0.125***	0.030
家庭特征						
家庭规模	-0.328*	0.149	-0.005	0.021	-0.068***	0.019
家庭收入(对数)	-0.154	0.159	0.032	0.022	0.027	0.020
老家无困难	0.229	0.449	0.119 [^]	0.062	0.162**	0.057
附属参数						
cut1	89.053	3.199	-1.168	0.448	2.249	0.403
cut2	—	—	-4.040	0.450	0.364	0.402
cut3	—	—	-5.867	0.453	-1.634	0.403
LR 或 F 值	51.780		-5835.443		7462.420	
R ² 或伪 R ²	0.205		0.164		0.061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数据来源: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2.“漂老族”与“老漂族”子样本模型分析结果

老年流动人口并非一个同质群体。为考察其内部的分化,本文对样本进行分类建模,按到现地的初始年龄、流动原因、户籍、性别等变量加以分类考察。结果显示,空间变化对不同子样本社会适应的影响性质比较类似。因此,本文中只展示初始流动年龄这个子样本的模型分析结果。

人口的空间转换最初多出于经济考量。流动的年龄选择性意味着低龄人口更可能发生空间变动,但在大流动和快速城镇化时代,流动已成为很多中国人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部分务工经商之人在流入地变老,成为“漂老”一族;而出于代际互惠或异地养老目的而流动的“老漂”也愈发普遍。本质上,“漂老族”和“老漂族”反映了不同生命阶段社会角色的变化,他们对流入地的预期和需求亦可能有别,因而也产生了社会适应的差异。

现有研究多以首次流入本地的年龄或 60 岁作为划分二者的依据。但是,他们最主要的差异可能更在于角色身份之别,与自身的文化、角色期待等因素相关联(正名,1986)。因此,仅以生理年龄作为划分“老漂族”与“漂老族”的依据似有不妥。因孙辈诞生、长辈赡养、退休与养老等生活事件的发生,一些人在 60 岁之前即已退出劳动力市场,实现地域流动。而且,不少中国女性在 55 岁甚至 50 岁就已过上“类”老龄的生活;即便是男性,55 岁前后找到工作的机会也明显走低;加上空巢期与更年期交叠、家庭责任变化与个体机能退行的共同作用,流动原因在 55 岁左右也会发生较大变化。换言之,界定“老漂”与“漂老”,既要关注生理年龄,也应关照生命历程理论所言的社会年龄,将二者背后的意义加以关联。“老”既体现为行走不便和生活不能自理,也是一种社会性的事件与呈现。可见,尽管将 55 岁当作划分老龄人口的年龄下限并不合适,但 55 岁或可较好地满足对“漂老族”与“老漂族”的区分。

表 2 展示了这两类人群的模型分析结果。概言之,空间因素与他们社会适应的关系总体类似,但系数大小和关系性质也有明显差异。比如,对漂老族而言,流动跨越的行政区域只对文化适应产生影响,即省内流动人口,尤其是省内跨市流动者更可能保有“按老家习俗办事”的传统;对老漂族而言,物理空间变化越小,越容易发生心理适应。公共活动空间变量对这两类人群的心理适应和行为适应的作用比较一致,且与全部样本结果相似,对漂老族的影响大于对老漂族的作用。无障碍设施则相反,而这似乎正好印证了各自流动的目的之别。

制度空间对受访者社会适应的影响较弱,但乡一城流动人口的适应程度更低,老漂族更是如此;而除个别情况外,有居住证和社保卡之人的适应状况更好,但多不显著。2016 年,李克强总理签署《居住证暂行条例》,旨在推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推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进程。但在实践中,至少对 60 岁及以上人口而言,它尚未发挥预期中的作用。网络空间对这两类流动者的作用也大同小异,与本地人交往可提高老年人适应水平,且对老漂族的作用更大。与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相比,精神空间度量指标对漂老族和老漂族社会适应的影响更为一致,其性质不因流动者首次流动的年龄而有性质上的区别。

表 2 老年流动人口社会适应模型分析结果:漂老族和老漂族样本比较

	漂老族						老漂族					
	M4		M5		M6		M7		M8		M9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物理空间												
流动空间(跨省为参照组)												
省内跨市	-0.391	0.752	0.092	0.108	-0.255**	0.098	1.139*	0.537	-0.081	0.073	0.028	0.067
市内跨县	1.061	0.898	0.255*	0.132	-0.052	0.120	1.980**	0.643	0.080	0.087	-0.038	0.080
公共活动空间												
有连片出租屋	-2.200**	0.697	-0.322***	0.101	-0.232*	0.092	-1.264*	0.511	-0.115^	0.069	0.018	0.064
有小商店	-1.218	1.912	0.701**	0.261	0.149	0.251	-0.719	1.311	0.204	0.175	0.463**	0.163
有无障碍设施	0.434	0.693	0.195*	0.101	-0.223*	0.091	1.984***	0.490	0.104	0.067	0.039	0.062
社会空间												
制度空间												
农村户籍	-0.451	0.878	-0.042	0.128	-0.260*	0.115	-1.246*	0.598	-0.109	0.082	-0.422***	0.075
有居住证	0.868	0.676	0.097	0.098	0.060	0.089	0.450	0.495	0.150*	0.068	0.058	0.062
有社保卡	0.499	0.681	0.112	0.100	-0.046	0.090	0.292	0.506	-0.049	0.069	0.035	0.064
网络空间(本地人为参照组)												
其他人	-2.359**	0.888	0.062	0.128	-0.275*	0.115	-1.916***	0.523	-0.139*	0.072	-0.190**	0.066
无交往	-0.869	0.750	-0.188^	0.109	-0.149	0.099	-1.926**	0.642	-0.220*	0.087	-0.225**	0.080

续表 2

	漂老族				老漂族								
	M4		M5		M6		M7		M8		M9		
	(心理适应 OLS 模型)		(行为适应 ologit 模型)		(文化适应 ologit 模型)		(心理适应 OLS 模型)		(行为适应 ologit 模型)		(文化适应 ologit 模型)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社区空间													
有党组织	1.376 [*]	0.761	0.242 [*]	0.112	-0.100	0.102	1.670 ^{***}	0.516	0.089	0.071	-0.168 ^{**}	0.065	
有法律援助室	1.100	0.731	0.251 [*]	0.106	0.168 [^]	0.096	-0.930 [^]	0.547	0.244 ^{***}	0.075	-0.112	0.069	
精神空间													
歧视感受(完全没有为参照组)													
基本没有	-8.065 ^{***}	0.796	-1.713 ^{***}	0.123	-0.789 ^{***}	0.100	-7.843 ^{***}	0.552	-1.667 ^{***}	0.081	-0.692 ^{***}	0.067	
有时有	-10.722 ^{***}	1.088	-2.127 ^{***}	0.166	-1.136 ^{***}	0.142	-10.786 ^{***}	0.814	-2.194 ^{***}	0.116	-1.201 ^{***}	0.099	
经常有	-0.204	1.813	-3.066 ^{***}	0.276	-1.718 ^{***}	0.264	-2.252	1.389	-2.593 ^{***}	0.211	-1.929 ^{***}	0.192	
长居打算(有为参照组)													
没想好	-5.784 ^{***}	1.071	-0.067	0.149	-0.248 [^]	0.141	-5.750 ^{***}	0.686	-0.237 ^{**}	0.091	-0.227 ^{**}	0.085	
无	-9.211 ^{***}	1.895	-0.448 [^]	0.268	-0.164	0.259	-15.829 ^{***}	1.168	-0.478 ^{**}	0.158	-0.627 ^{***}	0.149	
老家习俗(不重要为参照组)													
不太重要	-3.205 ^{**}	1.087	-1.956 ^{***}	0.192	—	—	-3.501 ^{***}	0.815	-1.774 ^{***}	0.139	—	—	
重要	-7.194 ^{***}	1.075	-2.461 ^{***}	0.193	—	—	-6.273 ^{***}	0.809	-2.163 ^{***}	0.140	—	—	
很重要	2.513 [*]	1.247	-2.391 ^{***}	0.218	—	—	2.311 [*]	0.921	-1.871 ^{***}	0.155	—	—	

注:(1)模型的控制变量与表 1 相同,控制变量和其他附属参数结果未在表中展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来信索取。(2)漂老族的样本量为 1906(占 31.48%),老漂族的样本量为 4146(占 68.52%)。(3)^{*} $P < 0.1$,^{**} $P < 0.05$,^{***} $P < 0.001$,[^] $P < 0.01$,[^] $P < 0.001$ 。
数据来源: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从理论上讲,在不同生命周期流动可能带有不同的目的,对流入地有别的预期,由此带来不一样的适应后果。而空间变量与这两类人群社会适应的关系差别不大,其背后原因值得仔细推敲,也是后续研究(包括质性研究)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可能不是同一类人,或为经济原因而流动,或为家庭与社会原因而流动。初始流动年龄虽可作为社会分层的一个依据,但“流动”属性本身对适应观念和行为建构的意义可能更大。另一方面,流动老年人之间可能也存在身份转换,同时,早年的社会化历程对行为建构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惯性。

就控制变量而言,它们与三个因变量的关系既有类似模式,亦有一定差别,且该差别还体现在不同的子样本中。就全部样本而言,流动老年人的社会适应不因年龄和性别而异,但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三类社会适应状况都更好,且教育对行为适应的影响更大。在业者的心理和文化适应程度更低,也许与职场的年龄歧视和压力有关,也许是因为在业者的流动目的更侧重于生计。的确,因经济原因而流动的老年人的心理和行为适应程度更差(虽多缺乏统计学意义)。居留时间越长,心理和文化适应越好。

家庭规模较大的受访者的心理适应水平明显较低,保有更多传统价值观念,且卫生习惯与本地人的距离也更大(但不显著)。进一步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规模较大的家庭中生活的老年人多是随迁或提供照料者,故他们的生活更可能局限于家庭中,缺乏与他人交流交往的机会与空间,也更难适应流入地生活。老家在田地耕种、长辈赡养等方面没有困难则可以提升他们的文化适应水平。

从两个子样本来看,长期居留打算与行为和文化适应的关系在老漂族中是显著的,但在漂老族中并不显著。受教育程度对老漂族行为适应的影响远大于对漂老族的影响。家庭规模仅仅不利于老漂族的行为适应。

五、主要结论与讨论

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和史无前例的自发式人口流动是近40年中国社会的主要人口表征。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流动人口历经世代轮替,但与经典迁移流动理论预测不同的是,中国老年流动人口的规模愈发庞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常态化现象。地域流动改变了老年人的生活空间,让他们在各方面都产生了调适的需要。本文利用具有时效性和代表性的数据展开经验层面的探索,对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予以刻画,以期抛砖引玉,引发学界对该群体、对此议题更大的关

切。本文主要结论总结如下。

第一,从适应模式看,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呈现出“高心理—中行为—低文化”模式,心理适应较易,文化适应更难,具有明显的梯次效应,不同领域和维度的适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而这种不同步性恰与老年人自身的属性特征相契合。老年流动人口,特别是自主选择流动的老年人往往在主观上对流入地有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希望本地市民能接纳自己,希望自己成为流入地社会的一员。这既可能是真正的认同作用,也可能是心理上的文饰或合理化效应,以减少情感冲突、保持精神上的愉悦与平和。

但是,高心理认同并不意味着行为上的良好适应。仍有超过 1/5 的老年流动人口在卫生习惯方面与流入地市民存在差异。22% 的比例虽不算高,但卫生习惯可能是最初级的行为适应,特别是考虑到超过 1/3 的流动者来自省内,而且他们的平均居留时间超过 8 年,其差异理应更小。据此研判,流动老年人的行为适应状况亦不乐观,表明人一旦形成了某种生活习惯,要改变它并非易事。

流动老年人的文化适应程度更低。对于老年流动人口而言,文化观念已然植根深厚,调适难度更大,故尽管部分老年流动人口已在流入地生活多年,但超过一半的人仍旧认同老家的风俗习俗与价值取向。进一步的数据挖掘表明,在流入地居住时间最长的是务工和经商的流动人口,其本地居住时间超过 11 年,很多人在流入地逐渐变老。但与因其他原因而流动的老年人相比,他们与本地户籍人口交往的比例最低,没有与任何人交往的比例仅次于因照料原因而流动者;后者的平均居留时间也超过 6 年,但四成多的人主要囿于家庭中,未与任何本地人发生交往。

上述这些是全部样本中的特征,“漂老族”与“老漂族”子样本也大体如是。心理意愿、行为改变和文化调适是在与他人交往中逐渐发生的。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社交网络对这三个面向的适应影响都很大:与本地户籍人口的交往有助于扩大流动老年人的活动范围,改变他们既有的文化观念,推动适应进程。而无论是较少与本地人交往,还是根本不与人交往,都将延长他们的适应过程。

第二,多维空间与三个适应变量的关系模式较为类似,对三者的影响程度大同小异;基于该理论提出的研究假设多得以验证,表明即便是在处于社会大转型期的中国,空间理论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可为老年流动人口或广大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提供一个较好的理论分析框架。而空间变量对各子样本影响的趋同性体现出原生环境影响的持续性和老年人群内部较强的同质性。

概言之,新的空间越具有包容性,就越有利于社会适应。在三种空间之中,

精神空间效应最大,对全部样本和“漂老族”“老漂族”子样本都是如此。就物理空间而言,流动跨越的行政区域级别越高,社会适应难度越大,适应水平越低。中国的行政区划具有科层制组织特征,省市县按等级依次排列,下级必须接受上级的管理与指导。这种与地理空间相交织的分层管理方式对不同物理空间范围内的关系、制度、文化等也加以规定,从而实现了对身处其中的人口的区隔化管理。于是,实现行政区域的横向突破或纵向跨越的距离越大,需消除的壁垒越多,难度越大,流动老年人的适应情况通常也较差。

制度空间越可保障老年流动人口的权利,社区公共生活越具有开放性,就越有助于提升他们的适应水平。户籍通过公共权力运作、资源配置、权利规定等确定个体在社会空间内的具体位置。加上与户籍地的脱嵌,共同形成个体生存和权利场域之别,造成禀赋要素的差异且深深烙印于整个生命历程。这些效应均可通过城一城与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累积优(劣)势呈现出来。尽管在行为方面户籍类型的效应不大,但主观测量上的城乡差异明显。同理,如社区流动人口较多,与本地居民的交流渠道受阻,交流机会较少,社会网络水平较低,适应水平也就较低。换言之,这些流入地通过物理空间的边界和区隔,形成了本地一外来的“二元”社会空间,有效地将老年流动人口区隔开来。

同理,精神空间越具有可达性,老年流动人口就越容易适应。在空间变量中,对社会适应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精神空间。而且,在模型所有变量中,老年流动人口的歧视感知对各类因变量的影响几乎都是最大的。物理空间的变换和社会空间的改变带来精神空间的转移。文化的惰性使得老年人在早年成长经历中镌刻下来的传统文化印痕不会轻易消失;且老年人的符号解码系统、价值观念体系等相对稳定,网络空间的重建和符号解码的能力都会受限,故更易将传统行为和理念带入新环境,将自身感知投射于现实社会,推己及人。如上文所言,六成以上受访者仅与非本地人交往或无人交往,这无疑会阻碍他们的适应进程;反之,若变换后的精神空间的可达性更强,则老年人更易适应新环境。可见,社会适应明确指向了本地人—流动者之间的互动性以及不同适应维度间的关联性。

第三,社会适应呈现出较强的人口与经济特征方面的同质性,年龄和性别尤其如此。从理论上讲,生理条件、生命历程、制度和禀赋要素等方面的差异可能带来老年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年龄、性别差异。尤其是对于“漂老族”而言,年龄较大者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更长,认同感与归属感一般会更强,对流入地的惯习与文化更为适应。一般情况下,女性更易与人发生互动,因而更易融入流入地社会中,但本研究发现,其实不然。这也许再次反映出早年社会化进程的持续效

应、原生环境的惯性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当下老年人群体内部较低的异质性。

空间变换伴随着制度与文化等诸多场域的变化。不同行政区域有差异化的利用空间、实现人口管制的措施和手段,也会改变流动人口的生活模式。以物理空间转换为基础的制度空间、精神空间的变化,使得个体原本依赖的符号系统及由此产生的互动情景发生矛盾甚至冲突。而外部环境体系庞大,稳定性较强,通常不因个体需求而发生即刻改变,个体只能通过自身行为、心理、文化调适去融入与适应新环境。个体的主动适应并非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也不是仅需自身努力和主动即可,而是受制于外部环境并与之双向互动,由此带来不同个体适应程度的异同以及同一个体在不同适应维度上的阶段性。

当然,社会适应和空间变换都是内涵丰富但外延模糊的概念,将二者加以关联的研究难度很大。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将老年流动人口置于“老年”和“流动”交互的框架中,突破了以往多数研究聚焦于低龄流动人口的局限。当然,受限于笔者的学术素养和数据,这个议题在理论思考、概念度量、类别划分以及变量之间的内生性控制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斟酌与深究空间,这些也是后续更深入、更精细研究的重要话题。

在当今社会,老年流动人口带着各自的物质追求和精神诉求,来到一个新的场域,既难以适应流入地生活,也难以退回故里。他们在夹缝中生存,遭遇心理或精神困境。而把握老年流动人口真实的适应需求,促进有认同、归属意愿的老年人的社会适应可有效缓解这些问题。因此,须用长远眼光来看待他们,打破既存制度划定的空间边界,模糊他们在新空间面临的社会、文化/精神边界,消解适应理念与多维度空间变换带来的现实张力,不让适应意愿悬在空中,停于理念;重视流入地在老年人文化、精神方面的包容性建设,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的路上,不让规模日益庞大的老年流动人口的福祉受损。

参考文献:

- 布迪厄,皮埃尔,2003,《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布迪厄,皮埃尔,华康德,1998,《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陈薇,2015,《城市社区权力秩序:基于社会空间视角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陈友华,2016,《异地养老:问题与前景》,《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
- 陈竹、叶珉,2009,《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空间?——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与空间公共性的判定》,《国际城市规划》第3期。
-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6,《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8》,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 侯建明、李晓刚,2017,《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人口学刊》第 6 期。
- 江立华、王寓凡,2016,《空间变动与“老漂族”的社会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第 5 期。
- 姜肖含,2015,《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青年文学家》第 11 期。
- 姜向群、季燕波、常斐,2012,《北京市老年人异地养老意愿分析》,《北京社会科学》第 2 期。
- 李芳、李志宏,2016,《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概念和指标体系研究》,《南方人口》第 6 期。
- 李敏芳,2014,《随迁老人社会适应研究述评》,《老龄科学研究》第 6 期。
- 林聚任,2015,《论空间的社会性——一个理论议题的探讨》,《开放时代》第 6 期。
- 刘亚娜,2016,《社区视角下老漂族社会融入困境及对策——基于北京社区“北漂老人”的质性研究》,《社会保障研究》第 4 期。
- 孟向京,2009,《北京市老年流动人口的适应性分析》,宁越敏主编《中国城市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苗瑞凤,2012,《老年流动人口城市适应性的社会学分析》,《中国老年学杂志》第 18 期。
- 牛俊伟、刘怀玉,2012,《论吉登斯、哈维、卡斯特对现代社会的时空诊断》,《山东社会科学》第 3 期。
- 潘可礼,2015,《亨利·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 涂尔干、爱弥尔,2011,《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世斌、申群喜、连茜平,2013,《广州流动老年人口的社会支持与融入》,《探求》第 3 期。
- 王颖、黄迪,2016,《“老漂族”社会适应研究——以北京市某社区为例》,《老龄科学研究》第 7 期。
- 王泳仪、王伟、严非,2017,《上海市流动老年人卫生服务利用的定性研究》,《医学与社会》第 2 期。
- 夏玉珍、姜利标,2010,《社会学中的时空概念与类型范畴——评吉登斯的时空概念与类型》,《黑龙江社会科学》第 3 期。
- 许伟、罗玮,2014,《空间社会学:理解与超越》,《学术探索》第 2 期。
- 杨彬,1996,《社会空间·场论》,《北方论丛》第 6 期。
- 杨春洗、康树华、杨殿升,2003,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编委会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刑法学 犯罪学 监狱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杨菊华,2018a,《流动时代中的流动世代:老年流动人口的多维特征分析》,《人口学刊》第 4 期。
- ,2018b,《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逐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 姚兆余、王鑫,2010,《城市随迁老人的精神生活与社区融入》,《社会工作》第 9 期下半月。
- 余昆,2013,《关于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文献综述》,《社科纵横(新理论版)》第 4 期。
- 悦中山、王红艳、李树苗,2017,《流动人口融合政策与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 5 期。
- 张笑夷,2018,《列斐伏尔的“空间”概念》,《山东社会科学》第 9 期。
- 张新文、杜春林、赵婕,2014,《城市社区中随迁老人的融入问题研究——基于社会记忆与社区融入的二维分析框架》,《青海社会科学》第 6 期。
- 正名,1986,《社会性衰老初探》,《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 郑震,2010,《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 周皓,2002,《省际人口迁移中的老年人口》,《中国人口科学》第 2 期。
- Alba, R. & V. Nee 2003, *Remak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Assimilation and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assmann, H. & R. Münz 1994, "European East-West Migration, 1945 - 1992."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8(3).
- Goldscheider, C. 1983, *Urban Migrants in Developing Nations: Patterns and Problems of Adjustment*.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Glick, J. & J. Park 2016, "Migration, Assimil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In M. J. White (e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New York: Springer.
- Habermann, M. & M. Stagge 2015, "Indicators for Monitoring the Integration of Elderly Migrants in the Municipal Infrastructure for Elder-care." *Bundesgesundheitsblatt-Gesundheitsforschung-Gesundheitsschutz* 58(6).
- Hall, K. & I. Hardill 2016, "Retirement Migration, the 'Other' Story: Caring for Frail Elderly British Citizens in Spain." *Ageing & Society* 36(3).
-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lden, Oxford, Carlton: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Litwak, E. & C. F. Longino 1987, "Migration Patterns among the Elderly: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The Gerontologist* 27(3).
- Longino, C. F. & D. E. Bradley 2003, "A First Look at Retirement Migration Trends in 2000." *The Gerontologist* 43(6).
- Tong, Y. & M. Piotrowski 2012, "Migration and Health Selec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1997 - 2009."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1(4).
- Yaskevich, R. A., E. V. Derevyannikh, L. S. Polikarpov, N. G. Gogolashvili, E. V. Tapygina, E. L. Davidov & E. V. Kozlov 2014, "Estimati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Elderly Migrants of the Far North in the Period of Readaptation to New Climatic Conditions." *Advances in Gerontology* 4(3).

作者单位: 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杨 可